

全球气候治理 迎来新阶段

□韩一元

《巴黎协定》于4月22日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75个国家于当天签署协定,创下一天之内签署国际协定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也标志着各国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迈出全新一步。《巴黎协定》是第一份覆盖近200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是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又一里程碑。

在《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会前多次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并亲自出席巴黎大会开幕式,系统阐释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为谈判提供了重要政治指导。中国向大会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极具雄心,承诺在2030年前尽早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绿色转变是巴黎气候峰会成功的关键。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将继续兑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落实《巴黎协定》,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巴黎协定》开放签署时间将延续至2017年4月21日。路透社报道称,该协定只有在至少55个国家(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至少55%)批准之后才能生效。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22日均承诺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批准协定,这提高了人们对该协定更快生效的预期。有外媒报道称,该协定原计划2020年生效,但若各国加快批准进度,在今年或2017年初就有可能正式生效。

尽管《巴黎协定》的落实仍面临不少

障碍和挑战,但其积极意义仍值得肯定。协定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模式,灵活地确立了“自下而上”、覆盖更广的全球减排新框架,并首次确定了5年为周期的评审机制,所有缔约方都将在“衡量、报告和核实”的同一体系中汇报其情况。这种模式既能为促进各国实现低碳转型提高有效动力,又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留下灵活性,被诸多非政府组织称为“阳光条款”。通过自主行动推动国际协调的机制也为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借鉴,通过给予各方一定灵活性,提高行动力度,强化透明度,促进各方建立互信和开展合作。

伴随协定生效,全球气候治理将迎来新阶段。各方将在协定框架下,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不再继续增加,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活动排放与自然吸收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化石能源的使用或在本世纪中终结。为此,各缔约方需制定相应政策,加快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能源浪费、停止补贴化石能源,增加对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零排放能源投资,提高建筑能效,研发更高效的电动车和电池技术,采用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扩大植被面积等。近期一些国家政府和商界加大支持新能源力度、退出化石能源投资等决定表明,各界依旧保持了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有充分理由相信,各国会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和速度采取行动。

(作者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奥巴马欧洲行:真朋友还是假客气

□孙成昊

4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了访问沙特、英国和德国之行,尽管目的各有不同,但都可以用“告别之旅”或者“修复关系之旅”加以总结。

美国和沙特两个盟友因为伊朗核协议、叙利亚危机等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在利雅得遭受冷遇的奥巴马或许希望从英德两国身上找寻到了一丝慰藉。然而,美英、美德的传统友好关系看似和和气气,实则暗流涌动。

在英国,奥巴马受到了皇室的热情款待。奥巴马还与卡梅伦在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深情回忆两人深厚私交,强调两国“特殊关系”坚不可摧。在德国,默克尔邀请奥巴马出席世界规模最大的工业技术博览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奥巴马也成为第一个出席这一博览会的美国总统。同时,奥巴马在难民政策上力挺默克尔,称默克尔是值得信赖的伙伴。默克尔也不失时机地“投桃报李”,表示与奥巴马有着友好密切、值得信任的合作。

实际上,美英、美德关系的发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就美英关系而言,“特殊关系”日渐弱化恐怕将成为未来趋势。奥巴马、卡梅伦执政期间,两国关系虽未现重大裂痕,但协调合作缺位,特殊关系成色明显不足。两人上台后均推行“务实”“收缩”为主的对外战略,彼此期待与现实不符。美国尽管仍强调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但希望英国等盟友在

地区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然而,卡梅伦上台后为整顿财政赤字压缩军费,外交政策务实色彩浓重,注重为商业利益服务,与新兴国家发展积极、均衡的外交关系,国内厌战情绪更促使其无心为美国承担更多。

美德同样面临着深刻的战略分歧。在欧盟内,德国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断上升,而英国身处欧元区、申根区之外,远离当前欧盟治理任务的核心,美国对欧外交逐渐以美英或美法关系为核心向美德关系倾斜。但冷战后两国对国际政治看法愈发不同,战略矛盾日益加深。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元危机促使两国在安全、经济问题上逐渐“分道扬镳”。德国并不满足于只成为美国的“小伙伴”或“跟班”,将更多考虑自身和欧盟整体利益,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比如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德国反对北约在中东欧加强军事存在,更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

奥巴马任内,由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一直轻视跨大西洋关系,全然不考虑盟友面对的处境和困难,自己竭力从中东抽身的同时却要求英、德等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奥巴马这种对待朋友“多取少予”的态度,即便能维持表面的热络,也难赢得朋友的真心。

(作者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近来,沙特内外政策“大招”频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赚足眼球。外交上,沙特国王萨勒曼4月7日至15日接连出访埃及、土耳其,国王之子、副王储兼国防部长小萨勒曼11日出访约旦,父子罕见同时出访,外交动作之大令中东多国为之注目。刚刚结束出访,沙特国王又迎来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19日的来访,由于访前爆出美国国内有人拟追究沙特政府“9·11”事件责任,令人又对

武装在伊朗支持下顶住沙特空袭、坚守首都萨那,沙特力挺的哈迪政府则始终是“扶不起的阿斗”;在黎巴嫩,伊朗盟友真主党势力不断蹿升,沙特支持的政治势力则日益萧索。究其原因,实际上还是因为沙特所谓的“逊尼派领头羊”徒有虚名,仅靠“金元”收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层面的实力明显不足。对此,沙特王室心知肚明,因此必须加紧拉拢埃、土两大地区玩家,并团结约旦等“逊尼派小伙伴”。

沙特内外的未定之天

□龚正

沙美关系的未来浮想联翩。内政上,沙特面对低油价也是“蛮拼的”:先是在4月17日的产油国多哈会议上突然改弦更张,导致此前外界期待颇高的“冻产”协议最终破产。4月25日,小萨勒曼公布了名为“沙特愿景2030”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发誓结束沙特对石油的依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戒掉“油瘾”。综合看,当前沙特的内外处境可谓错综复杂,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都在上升,使得沙特为应对挑战时有些不知所措。简而言之,一切都是源于沙特深深的不安全感。

一方面,沙特外部处境日益险恶,致其急于寻求“拉旧友、觅强援”。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传统中东强国势力衰微,沙特被推上地区政治舞台,成为“逊尼派领头羊”。去年7月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有望摆脱制裁枷锁,地区影响力不断看涨,同时美国沙特关系裂痕则不断扩大。去年9月俄罗斯介入叙战局后,进一步搅乱中东乱局,为伊朗在地区发挥影响“撑腰”。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扫颓势,在多条战线均取得突破;在也门,胡塞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格局悄然发生巨变,沙特被迫“扼腕”推动经济改革。沙特大张旗鼓的改革计划完完全全是被逼的。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下挫超过60%。2015年,沙特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980亿美元。为填补财政亏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沙特政府连续出台削减汽油水电补贴、发行债券等措施。此次小萨勒曼的改革虽然决心大、信心满,但若想真正实现“华丽转身”仍有较大难度。目前,沙特经济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支出,超60%公民在公共部门工作,家庭收入绝大多数依赖政府支付的工资,私营部门支付的工资总数不足GDP的4%。追求经济多元化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但始终难以落实。

纵观沙特这一整套内政外交“组合拳”,表面上看似攻势凌厉、招招见血,细细琢磨则会发现其虚多实少、难有实效,折射出沙特当前内外“两难”、色厉内荏的尴尬处境,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沙特都将处于“未定之天”。

(作者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

土耳其购置防空导弹可谓一波三折。在国际竞标中曾考虑过俄罗斯的S-300、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生产的“欧洲防空系统”等,后来又相中中国的红旗-9,原因有三。一是从技术性能来看,红旗-9命中率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第二,中国愿意与土耳其共同生产红旗-9,有助于土耳其掌握先进的导弹技术;第三,中国红旗-9物美价廉,性价比更高。然而,在美国的施压下,去年11月土耳其宣布取消招标结果。今年4月,土耳其再次改口,声称将与北约连为一体,意在购买北约的防空导弹系

不满足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中土红旗-9合作项目恰恰符合“土耳其模式”的发展需要,是土耳其开展东西方平衡外交、实现大国抱负的重要载体。

其次,土耳其仍然将发展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视为防务的重中之重,它必须顾及西方的感受。令北约紧张的是,若土耳其引入红旗-9,这只是第一步,未来很可能继续引进中国其他武器装备,影响北约的军事一体化。土耳其一度要引进红旗-9,并不意味着埃尔多安政府要在防务上脱欧入亚,而是希望增加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土耳其卷

“土耳其式”买家的抱负与无奈

□孙德刚

土耳其出尔反尔,在防空导弹购置问题上左右摇摆,体现出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等大国虽然充满政治抱负,却力不从心的尴尬。

首先,土耳其政府骨子里不希望依赖任何大国,梦想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受人尊重的一极。土耳其是北约中唯一的中东国家,也是唯一的伊斯兰国家。2003年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中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外交的主体意识更强,积极塑造自身的“大国形象”,尤其在防务领域一方面强调与美、欧、中、俄的务实合作,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自主研发军事技术。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政策,在各大国之间摇摆,具体到防空导弹购置上就表现为多次进退、多种表态。埃尔多安政府宣布与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甚至要引入红旗-9,借此向西方表明土耳其

入叙利亚内战,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境冲突中与亚美尼亚为敌,国内恐怖主义和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上升,在击落俄战机后又与普京政府出现外交纠纷等等。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局势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当土耳其退而求其次,试图自主研发防空导弹技术时,又面临经济衰落、财政困难、国防预算不足和军事研发能力低下的瓶颈。无奈之下,土耳其被迫向北约示好,寻求购买北约的防空导弹。

土耳其既不属于东方,又不属于西方;既不是世界大国,又不甘心沦为小国。未来,即便最终选择北约的防空导弹,其与美国和欧洲大国的防务合作也会面临各种变数。大国围绕土耳其防空导弹购置和防务合作的博弈,仍将继续下去。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